

（二〇一五年九月二十二日出版）

本期目录

【口述历史】	江青最后一任保健护士谈江青	马晓先
【百家争鸣】	林彪知道去苏联吗？——与张光渝先生商榷	舒 云
【历史疑云】	扑朔迷离：《五七一工程纪要》发现辨析	胡景文
【劫后反思】	清华文革反思——“红卫兵运动”的兴、盛、衰	邵济群

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
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浏览，网址为：<http://museums.cnd.org/CR>。

【口述历史】

江青最后一任保健护士谈江青

• 马晓先 •

主持人：郑仲兵、李宇锋
参加者：杨银禄、阎长贵、赵柳恩、周淑英
访谈对象：马晓先（江青最后一任保健护士）
时间：2006年2月25日

◇ 初到江青处

李宇锋（简称：李）：您是江青最后一位护士，在江青那里一直工作到她被隔离审查，还监看了她一段，从服务到监护，这种角色转换很有意思。现在就请你谈谈有关情况。

马晓先（简称：马）：我的工作是护理，做具体的事情，那么我们所接触到的，听到的，看到的，就是单纯的日常生活中的这点事。

就像前面她俩（赵柳恩、周淑英）说的，我们这些护士跟别的护士不一样，什么都管，超出了一般护士或一般保健护士工作的范围。

我想起刚进十楼（钓鱼台十号楼——编者注）时候的那种感觉。感觉什么？就像在电影里一样：她起床，打铃。一听到铃声，护士就赶紧给她静悄悄地递杯子漱口，递体温表量体温，服务员就赶紧送开水，秘书就赶紧准备办公的文件，厨师就赶紧准备饭菜……就这一套吧，只要这铃声一响，十楼的人员整体地就动起来了。

当然，我觉得这里的工作人员都挺好，互相配合，特别默契。我主要是接小赵（赵柳恩，马晓先的上一任）的班，交接班特别细。实际上，大事真的不多，但是细小的事特别多，而且往往出事还都出在这些细小的事上，这些事可能在别处不算什么，但是一到这儿真

是可以上纲上线成为政治性的问题。而且我在那段跟她们在的时候还有些不同，小周（周淑英）她们在的时候生活护理工作可能更多一些，我在这段感觉生活护理上没有特别苛刻的那些了。

赵柳恩（简称：赵）：别的呢？

马：其他的都一样。

在这儿工作，汪东兴给我交代的就：你只要组织上服从，把工作做好，不要多跟你们保健处领导汇报，也不要多给家里打电话，不要跟家里说，给单位领导也不要写条子，有事就直接找我和张耀祠。

我没有什么过多的想法，你让我在这儿我就在，你不愿意让我在这儿我就走，随时可以。另外我来这儿之前有个思想准备，知道这儿工作难做。因为那时我已经照顾了李讷一年多，从李讷怀孕之前那次发烧我就开始照顾她，包括她怀孕以后整个孕期的护理、用药，还有产前的准备，这些都是我给照顾的。产后的恢复期，吃中药的调理，都是由我来护理的，直到她请了阿姨三四个月后我才离开。

从李讷那儿出来以后没多久，由我们的保健处长陪着，汪主任找我谈了一次话，要我到江青那儿工作。我说我爱人得了急性肝炎，全身都是黄的，真不适合到那儿去，要传染上这个责任怎么负啊？不要说我了，你组织上也得负责任啊！汪主任一听也有点害怕了：“那就算了，算了，我再找吧！”过了一个多礼拜，他又把我叫去了（这次陪我去的是傅成舟，他是我们的副主任），说你还得去，她的条件：第一护士要科班出身的，第二要脾气好的，再就最好生过孩子的（因为对孩子要有耐心啊，对她照顾也得有耐心）。汪说你挺符合这些条件的。汪东兴说：“现在就需要你去她那儿。”我还在那儿嘀嘀咕咕呢，汪特别生气：“你还是不是共产党员？”我说是。“你是共产党员不服从组织分配？”我说我服从是服从，可思想上不通啊！他说：“你思想上不通没关系，只要组织上服从就行。”

当时我没办法，就去了。第一印象我的记忆很平淡了，就是和她见个面，我介绍一下自己的情况，好像没说别的，连手都没握。

说实在的，在她那儿工作，我们很看重她的睡觉，只要她睡好了觉，我们大家都高兴。早上起来我们问她睡得怎么样，她说“还行”或者“还马马虎虎”，这马马虎虎也行了，她只要睡好了，脸上的表情就觉得还好。回头一跟其他工作人员说，大家都觉得挺高兴的。

我印象特别深的是她走廊里铺的地毯，因为下面是地板，走起来难免有咯吱咯吱的声音。忘了是哪位工作人员，在地毯上用粉笔画了不少圈，标出有响声的部位，我们走的时候绕过那个圈不走，走空隙，怕响了以后又影响她睡眠。

我的脾气应该说是比较急的，但在她那工作你得又急又不急：她一打铃，你就得到，不快不行，不能让她打个两次三次的；但你走太快了就会喘，那又不行。我们就先走快点，等快到她面前了，定定神，平静平静，再进去。所以当时精神状态比较紧张。后来慢慢地也就习惯了。

当时我还有一个最大的转变，就是生活习惯。老感觉特别累和困，最困的时候，我记得赵柳恩跟我交班，看着那些衣服，看着看着我都打瞌睡了。小赵说你不能打瞌睡，我说我都困得不行了。她就给我抓一大把茶叶放在玻璃杯里，加一点水，也就刚漫过茶叶，她说你喝

点这个，半个小时就好。那个茶水特苦啊！别说，真的过了半个小时就挺精神的。以后我就有这个经验了，一困的时候我就照着她这个方法去做。

我们的工作当然是根据江青的生活习惯来安排，一般等她上床睡了，也早上五六点左右了，但这时候人一般很清醒啊，你说怎么办呢？你要说不睡吧，第二天要接班怎么办？所以那时候我就拉上窗帘，吃上安眠药就睡了。那时候我把所有的安眠药都吃了个遍，没有我不吃的。过去我一觉睡六七个小时，醒来后头脑特清醒，工作效率也很高，后来在那儿我感觉生物钟全乱了。

在那儿工作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什么都不能落下文字。所以我们交接班都是非常小心谨慎的，什么时候该打什么针，哪个药该停了，我们都是口头交班，不能做什么记录。甚至萝卜吃了半个，那半个在冰箱里边，哪些毛巾、衣服在洗衣房，哪些没用过，在哪里放着，都得交代特别清楚。这些都是汪东兴，还有我们管护士工作的领导要求的，不许写日记，不许记文字的东西，因为要防止泄密。

我在江青那儿工作几年，我爱人一点儿都不知道。后来，都到了主席病危那时候了，有一次，我在家睡觉，江青那里来电话催我回去，我急匆匆唠叨了一句，他才猜出来我可能在江青那里工作。

当初我是生完女儿去她那儿上班的。女儿是3月份出生的，我是9月份到她那儿去的，歇了没几个月就到她那儿去了。我们都是一个礼拜回家一次。我在江青那儿干了三四年（包括后来对江青的监护），就是尽最大的努力做好工作。我们根本不顾孩子，不顾家，什么都不顾了。有一次，我孩子感冒发烧流鼻血，嘀嗒、嘀嗒地流，我也顾不上，回来后看她躺在沙发上睡着了，你想我会有什么感觉？把孩子弄起来洗洗擦擦，弄个饼干盒子放在暖气上，让她醒来以后有吃的。跟我在一块的护士说：“你怎么敢这样对孩子啊？”我说怎么办呢？我又请不起保姆，只能把孩子锁在屋里。我出去的时候就听孩子叭叭踹那个门，听着，听着，心里真是难受！但又有什么办法呢？

◇ 旁观江青和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陈伯达的关系

李：江青和张春桥这些人的关系密切么？

马：在江青的心里，挺在意张春桥的。她在意的最早的是康生，后来就是张春桥、姚文元，她要看电影就叫他们两人来，因为王洪文他自己有个屋子专门看电影，他老在家里看。

还有江青吃饭的时候谁都不能在那个地方。午饭前吃安眠药，吃完就睡觉。晚饭的时候，她就不像中午的时候那样，有时吃完晚饭就要去开会。我经过一次，她吃饭的时候把张春桥给叫来了，又让我到程师傅那儿给他准备一套碗筷。我想真不容易，因为她吃饭的时候不能旁边有人，不能旁边有嚼饭菜的那种声音，只能是放音乐或者是特安静。但那次张春桥就坐在她对面和她一起吃饭。他们是怎么分的菜我就知道了。他们一直在谈事。

杨银禄（简称：杨）：大概是开九大前，陈伯达起草九大报告，他写了一部分给主席看，主席看了后不满意，让江青跟陈说你写的这个不行，不合口味，他们两个就吵起来了。他们两个吵的时候张春桥和姚文元都没吭声，事后江青把他们两个叫到十楼，剋了一顿：“我是传达主席的意见，陈伯达还想绞缠绞缠，你们两个在那儿连个屁都不放，回去写检查！”张和姚真写了检查。

李：这个检查长吗？

杨：过我的手了，但我没看什么内容。就一两页，不太长。

马：在我们印象里面，一般张春桥不露什么表情，姚文元邋里邋遢，有时一边走一边穿衣服，衣冠不整。

王洪文有服务员，有护士。那会儿主席确实给他提供了非常非常优越的条件。王洪文是花花公子，根本不像党的副主席。

杨：张春桥、姚文元的秘书、警卫都是我们警卫局派的，不管从哪儿来的都是从警卫局中办那儿审查过来的。唯独王洪文的秘书、警卫是从上海带过来的。

◇ 主席逝世前后

马：在主席逝世前后江青有些事说一说。

从1976年8月20号起，主席身边有一个比较强的抢救小组在那儿值班，这个期间江青也经常去看看主席，她到底是怎么看我不知道。在这期间江青跟那儿的大夫说：“是不是给我也详细地查查身体？”大夫不敢违拗她，包括耳鼻喉科、口腔科全身给她查了一遍。

江青还告诉主席身边护士说：“你们要学会给主席擦汗。”

9月2号，就是主席去世的前一周，我们跟着她去大寨了。1975年开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的时候，她去过一次，还在虎头山挖了一个备战沟。这次到大寨后她又去看，发现填平了，她特生气，把郭风莲叫来，批评郭说：“你们落后了，你们骄傲了！”郭风莲说：“我们挖好了涵洞，备战的时候可以当作防空洞，平时水涝的时候可以排水。”1975年她到大寨主要是照相，照了好几张她戴头巾拿锄头、铁锹的劳动照片，还有和群众一块捆玉米什么的照片。那次她是照相热。此外，还骑马什么的。这次到大寨，她知道主席病重了，没有骑马、照相什么的。9月5号，值班人员就接到了要我们返京的电话，大家就坐火车从阳泉赶往石家庄，到石家庄以后我们又坐飞机到北京，一共20多分钟的航程。

还记得在主席去世前，具体时间就搞不清了（校订者按：1976年8月28日），她还跑到小靳庄，跟群众说：“我是代表主席来的，代表主席向你们问好！”她让邢燕子、侯隽她们两个代表知识青年给主席写信，写完信以后她说：“你们可以在信封上面写‘请江青同志转交主席’。”当时还有一个女青年还写了一首诗也一块装到这个信封里头。她在小靳庄还召开了一个群众会。

在主席整个病重期间，有一天夜里大概11点钟左右，她跑到新华印刷厂去看望地震以后的生产情况。有天晚上又去了清华、北大校园，去看望师生们。她走到那儿我得跟到那儿，所以我觉得很累。

和主席去世有关的，我还记得两件事。

主席逝世后，一个是她把所有的衣服全都染成了黑色，把毛衣什么的全都染成黑色，还订做了一套黑色礼服，一个很大的乔其纱黑纱巾，4条黑色手帕，都是乔其纱的，那种手帕因为不吸水，要是擦擦眼泪，擦擦汗很不方便。

再一个，主席去世的消息一公布，国内国外的信件不断地来。江青把这些信分作两摞：凡是写“政治局委员江青收”的放一摞，凡是写“毛泽东夫人江青收”的就放在另一摞。

以前江青跟我说过几句话，怎么提起来的也不记得了，但我记得很牢。有一次，她在我们楼的大厅跟我说：“你在我这儿工作，我是做政治工作的，是主席政治方面、国际方面的秘书。我这个人一般是不会犯路线错误的。你到我这儿工作难道你不高兴吗？”她就这样问我。“不过在我这儿工作呀也是有风险的，到时候修正主义上台是会杀头的，不过也可能把我软禁起来。杀头我不怕，我就怕这个不死不活的把我养起来。”那阵我就是30岁左右吧，听了她这些话就觉得挺害怕的，我们都是和平年代过来的，当时没理会到这其中的真正的深刻含义，现在想想，实际上后来发生的事情对于她来说早就有这个精神准备了。

◇ 参与抓捕江青

马：后来就是抓江青的事了。我记得抓江青那天是个星期四，当时江青住在中南海的二〇一。那天我已经下班了，正在后面洗自己的衣服，穿着双拖鞋。张耀祠就从前面绕过来，平时一般他很少到后边来的。我说，咦，您怎么来了？我感到很吃惊。他说：“小马跟我来一趟！”一看我穿着拖鞋呢，他说：“你把鞋换一下。”我就赶紧把衣服一撂也不洗了，然后回到房间把拖鞋换掉，跟着他后边走。我也没问他什么事，但是那时候吧我的心里就意识到有事，而且也意识到事情不会小。就跟着走，我也觉得没有必要问他，因为我们多年形成的习惯是不多问。绕过走廊就到大厅的门口，他说：“你开开门咱们进去。”我一到门口呀，一看原来那么大的大厅，两边全站满了武装战士，而且这些人我一个都不认识，我觉得这事就严重了。张局长说：“开门进去。”我就把门开了，什么都没说就进去，张局长就跟我后面进来了。我们进门以后，看到江青在那儿半躺着，她一般办公都是半躺着，一个脚垫踏着。我就站在那儿，张局长随后就跟她说：“现在我要向你宣布一下中央的决定……从现在开始对你进行隔离审查。”宣布以后江青就说：“你能不能再给我念一遍。”很短的几句话，张耀祠又给她念了一遍。她做了一下调整，就坐在那儿身子也没动，然后就低着头，但是能看得出来脑子在想，在琢磨这事。张耀祠说：“钥匙该交的就交一下。”她说：“我交给谁呀？”“你就交给我。”江青站起来，从裤子口袋掏出钥匙来，装进一个牛皮纸的信封，然后拿订书机给订上，很从容的，然后写上“交华国锋同志收”。她自己就提出来说我上趟厕所。张耀祠说：“你去吧！”她的厕所就在大厅的边上，她去了。这个时候张局长就跟我：“给她准备准备东西。”我把她的衣服，换洗的，洗漱用品都给拣了一遍，拣好了给她装进箱子里，那时候因为经常往外跑干这些都熟练了，很快都收拾好了。收拾好后我就从她卧室出来了，出来一看她还在厕所，还没出来，这个时间大概得有10分钟吧。张耀祠就说：“你进去看看。”然后我就把厕所的门开开进去了。她正蹲在那儿发愣呢！我进去也没说什么，她也知道我的意思是催她。她就稍微想了想，看看我，没说什么话，然后就慢慢悠悠地起来，从卫生间里出来。这个过程我觉得她显得挺镇静，但是脑子里一直在疑惑，她脑子里一直在想问题，一直在想事情。我把大衣给她披上，她在前面走，我跟在后面拎着箱子。打开门，一看有一辆大红旗（我进去时还没有看到有车子），里面坐的都是我们不熟悉的人，都是警卫团的，后来才知道有黄介元、马盼秋、高云江，高云江是押送江青小组的组长。坐在里面以后我记得一边是黄介元，一边是马盼秋，江青坐在中间，我坐在拉开的中间小座上。高云江坐副驾座上。

因为那个时候天就已经黑天了，看不太清楚了，黑乎乎地就走了。

◇ 在地下室看管江青

李：从这一刻起，您和江青的角色都发生了重大转变。

马：是啊！上了车，车里一个说话的也没有，她也没问什么。车一路开，一直开进地下室，在地下室就转，转了半天。我们下车以后，进了一个房间，一看，我觉得我来过这个地方。周围都是半人多高水曲柳的墙，因为主席的遗体放在那儿的时候江青和姚文元去看过主席的遗体，我陪着去的，所以一进去我就看出来了，我想江青也应该看出来了。一进去，我和江青先在小屋子的床上坐了会儿，江青就问我：“这是什么地方？”我说我也不清楚，她又看看，那儿有个台历，看后她也没吭气。但是，我想她看后心里也已经有数了。

江青最初歇脚的房间成了我们的值班室，有个大厅。她在套间里头，房间大概12到14平米，有一张床，一把椅子，一张桌子，有个水池子，有一间卫生间，有个澡盆，应该说条件还是比较好的。反正从那儿就开始了她的这种生活。

高云江向她宣布了几条规定：在这儿你没有报纸看，可以看书，有《毛选》，你要是想写什么东西可以给你纸给你笔。反正给她规定了几条吧！她听了以后也没有什么反驳。江青开始几天什么也不做，后来慢慢地，她就开始写点儿东西。

在生活上他们也给我交代了，说：“你现在不能再像以前做护士那样什么都照顾那么周到了，但是别人又不了解她，不好插手，你得在生活上招呼她，但又不能像护士那样亲近，要掌握这个尺度。在生活上，她自己可以自理的你要教她自己做。”

当时我的心里就感觉特别复杂！

李：完全可以想象您当时的感受。不知道江青本人怎么适应这个变化？

马：江青到了这里，一切都不一样了。

首先是吃饭，正餐是一荤两素一汤，开始她吃不下去，说这饭菜不想吃。不想吃工作人员就拿走，后来慢慢地她就吃点了，以后连窝头都要吃半个，一小碗米饭她能吃大半，就比较正常了，跟从前吃的量差不多。偶尔便秘，她还主动多吃点粗粮。我觉得她后来也想通了。

再就是睡觉。睡觉是她一贯的老大难问题，刚开始她可睡不着，折腾，就是把被子一会儿挪到这头来，一会儿挪到那头来，她也不知怎么好——睡不着啊！那都是硬板床，你想这么多年她哪里睡过这种床啊？睡不着就睡不着，睡不着觉了就看看书，拿《毛选》给她看，就是不能给她安眠药。她就整夜地不睡。我说那你在床上休息会儿，睡不着也躺在那儿休息。她也躺着，她也听我的，但她没有睡。因为她的门得敞着不能关，你想我们这都得是公开的，黄介元他们都在这儿坐着，还有几个不认识的战士都在那儿站着，她不敢轻易地去说什么话。开始睡不着，后来熬着熬着不知不觉呼呼地也就睡了，人到那种程度也逼出来了。大概3个月以后，她的睡眠逐渐正常了，有规律了。每到晚上，她看我们人少了，比如我也去睡觉了，她也在那儿和衣呼呼睡了。她从来不脱衣服。因为门不能关，大家都看着，所以她要换衣服就在卫生间小房里换。

江青生活上自理也有一个过程。开始她不会洗衣服，没用过洗衣粉。我说你自己试着洗衣服。她说用什么洗啊，我说你就用洗衣粉洗。她拿来洗衣粉就往衣服上倒。我就告诉她，你不能这样，这样就把衣服弄坏了，你得先把衣服放到水池子里，然后把洗衣粉溶化到水里，衣服弄湿后再洗。因为她一开始已经倒了洗衣粉了，就直接把衣服弄湿后洗的，然后

搓。她搓不干净，那也只好那样了，反正我告诉她了。后来，她又拿着抹布自己擦擦桌子，再擦擦床，都是慢慢地学，我开始也帮她弄弄，后来就不管了。我看到她写的日记（她写的东西都是公开的，都在那儿摆着），有一条说：“就连小马过去那么温和的、温顺的人，现在也要想骑在我的头上。”其实，我对她真没那么“横”，就是没以前那么体贴周到了。

在这期间，开始几天特别难过，因为我白天要陪她，晚上她不睡觉也得要在那儿陪她。她进到地下室的一个多礼拜，我每天就睡一个多小时。那个时候我觉得压力比较大，精神上也不是太好。就觉得我这护士怎么又变成看守了？这是我的事吗？有时自己想不通，我本来睡觉就不好，又加上连续这么几天心里浮躁，想的东西乱七八糟理不出个头绪来，心里很烦。

于是想找他们要点安眠药，我觉得首先得把觉睡好。我就跟我们送饭的俞师傅说，你给我拿点药吧。他问什么药呀？我说治老毛病的。结果他给我送来了活血化瘀治月经的药。我一看说，你怎么给我送这个药啊？他说那送什么呀？我说治睡不着觉的安眠药。他说那我拿得来呀？他们不会给我的，我要给你送了还不惩治我呀？我也不能让你吃啊！我说不行啊，你要不给我拿来，时间长了我真觉得受不了啊！你一定要想办法帮我，有责任我自己担着。又过了一天，他给我带了6片速可眠，哎哟，当时看到速可眠我如获至宝！吃了那个药，睡了一觉缓过来了。

大概一个多月以后，我实在撑不下去了，就跟上面提出再找一个人替换一下，不然我真顶不下来——这也不知道到什么时候结束。整天也见不着太阳，睡不好觉吃不下饭，再好的东西我也吃不下去，他们看到我那样也不行了，后来就打了个报告。找谁呢？后来从中央办公厅服务处调来一个叫陈世冠的服务员，叫来给我替换一下，我觉得好多了。

李：她来了以后，你和她轮班是一个人12小时吗？

马：不是，平时她不能完全代替我，还是以我为主，她主要是在我睡觉时帮助盯一下。

李：那她盯一下是到套间里呢还是在值班室坐着呢？

马：她就在门口，江青这个门是从来都不关的，白天、晚上或睡觉时都是从来不关的，外面就是一个大厅，我们可以坐在门口也可以坐在大厅，因为套间里面没有椅子。

李：里面有一张床，有一张桌子？

马：对，还有一把椅子，但那椅子都是她坐的，所以我们一般都坐在门口。她的门都不关，她干什么我们都能看得见。她去厕所我都得跟着，以前她去厕所我也得跟着。

有一次，江青要一本杂志类的东西，我们没给她，好像是不允许给。给她看的就是1—4卷《毛选》，其他的不给看。她写的东西是什么我们也不知道，我们这儿规定不许看的，那天正好她写完在那儿摆着，我搞卫生时看到了她写我的那几句，我看她的眼神和对她的态度也不像以前那样了。

以前，我在她那儿工作还算顺利的，她对我也发过脾气，可是对我还算不错，没发生什么大的事情；但该我注意的和做到的我都注意到了、做到了。

李：她这期间跟你谈过什么事，说过什么话吗？不能一句话不说光待着吧？

马：唉呀，这个你觉得不应该是吧？

李：我觉得不应该，您想在这地下半年时间两人面对面什么话都不说，这很难让人想象。

马：实际上挺尴尬的。话呢可能也说，具体的也记不清了。她有时也问，但她问什么，我也都回答不知道。

李：她都问你什么呀？

马：她好像问过外面的谁，但我现在真的记不起来了。

李：是政治方面的、形势方面的吗？比如华国锋、邓小平如何如何？

马：她没问过邓小平他们。

李：她自己写东西的时间多吗？

马：不多。

李：她是一写就是两三个小时，还是简短的两三条呢？

马：就写两三条，想起来了就写，每次大概写个十几分钟吧。

李：她最后交上的东西你没看内容，但您看大概量有多大啊？

马：反正它每张纸也写不满，有时给她收一下，有点什么都给收走了。

李：大概有一寸多厚？

马：嗯，差不多。

李：上面也没什么抬头，如什么中央办公厅之类……

马：对，没什么抬头。铅笔写的。红蓝铅笔，一直是红蓝铅笔。她用惯了铅笔，她也不乱画。

李：在《毛选》上她没有什么批注？

马：没有，没有。《毛选》她就是翻翻看看，你想她什么时候过过这种生活呀？你在那儿监视着我，我在这儿坐着，那个滋味挺难受的。现在看来江青对我们是有戒心的，她对我们有戒心，我们对她也有戒心。

李：比如她也不给你聊点家常什么的？

马：不聊。

李：原来不聊，现在这个时候应该会聊些家常啊？

马：原来还聊，这个时候反而不聊了。她会想：我跟小马一说话你墙那边又都知道，再说跟你说也没用啊！

李：这个期间有人来审讯吗？

马：我印象里对她好像组织过一次，这是黄介元他们组织的。我跟你们说黄介元的出面率是最高的。黄介元，年轻，有勇气，也敢说，比如交代江青干活，就说：“你怎么还不干？这就是你的工作！”她说：“我没干过。”“没干过有人教你啊！”都是这种话，别的也没有什么。

杨：黄介元当时是中央警卫团警卫科副科长。他有两个特点：第一个是脸色很严肃；第二个声音大、粗。

马：对，反正说出话来让人害怕，有一定的威力。

李：没有进行过真正的审讯是吧？

马：在地下室没有。

李：有没有领导人下来？

马：没有。那时候就是保证她安全活着，不要出现什么事。

李：除了这几个看押人员外，再也没有什么外人进来？

马：没有，就有一个给她送饭的司机。

杨：送饭的是给你们送还是给她送啊？

马：给我们送也给她送。伙食标准都是一样的，她吃什么我们吃什么。

对了，我给他们提意见，我说在这儿太难受了，都3个月了不见太阳，就觉得人失去正常的状态了，能不能有什么调节一下？后来他们说：“就你这提议给我们批了个太阳能灯下来。”大家轮流坐在那儿照一照。我一直待在那儿3个月，后来中间让我回去了一趟。

◇ 江青在地下室关押期间的作息

李：她每天的作息时间安排？

马：开始我觉得挺乱的，但所谓的乱就是她睡不着，翻来覆去地折腾，她也不知怎么好。她也分不清白天黑夜，因为她没有表，有时问问我几点了。后来她睡眠逐渐好了，基本上有规律了，可能是在3个月以后，每天到了晚上她就去睡了。

李：她一般睡觉都在10点来钟？

马：10点钟她不会睡的，睡不着。大概十一二点睡吧，睡眠还可以，比我都好，有时还有点小呼噜。

李：从常人的角度考虑，人到这种时候比较孤独，这么大的命运转折的时候，会希望有人可以倾诉，特别是女性，是不是更需要一种排遣甚至宣泄？

马：她不，她跟一般人不一样，没听过她主动给人说什么。

李：你说她十一二点睡，那她早上几点起啊？

马：早上大概六七点钟，有时五六点钟醒来，但这个时候少，一般都是六七点钟起来，起来以后自己刷刷牙，洗洗脸，梳梳头，反正这些事情都是她自己弄，毛巾也是她自己洗，那个时候她已经很正常了。

李：7点30分早餐，这应该是很规律的吧？

马：对。然后，上午有时她自己在屋子里散散步，不出她的屋子，就从她的大屋子到卫生间，从卫生间到大屋子，来回这么走走，有时是背着手，像若有所思的样子，有时坐在椅子上翻翻书，有时就写写，一天基本上是这样。中午吃完饭她也睡会儿觉。大概躺一个多小时，不一定能睡着，我们不叫她，她想睡到什么时候就睡到什么时候。

李：她上午和下午基本做的事都差不多，实际上是没事？

马：确实没事。她所谓的事就是吃饭、睡觉、散散步，然后看看东西，写点东西。

李：她躺着的时候多还是坐着的时候多？

马：差不多，两个比较起来还是躺着的时候多。坐的时候她坐在凳子上，桌子上有一摞书，还有纸、笔，就像在家里，但不像在家里办公，在这儿她就拿着一本书翻着。看书她都坐在凳子上，很少躺在床上看书，要躺就躺在床上一会儿。她这段时间还是相对自由的，想看书就看书，想写东西就写东西，想散步就散步，想上厕所就上厕所，她只要不违规，我们一般不去管她。

开始她还是有些便秘，在马桶上时间挺长的。

李：她饭量怎么样？

马：开始她吃不下，有的东西拿过来最后又拿走了，不过我觉得这段时间不长，也就几天的时间，后来慢慢就吃了，跟过去吃的差不多，饭量还可以。一小碗米饭她能吃大半，后来我觉得她吃的还真不少。她自己也知道，她说大便还是有点干，还是多吃点粗粮。

别的我不管，我就是执行上面的政策，保证任务完成，保证她的安全。我的身份是护士，从医疗保健的角度出发，过去是保证她怎样健康，现在我就是要保证她安全，不出什么事。她有怨言只能给我发，我说我也不愿意在这儿待，弄得我比过去还累，本来交班以后可以睡个大觉，可是我现在只能坚持着、熬着。在表面上我又不能表现出疲劳、憔悴，所以我要求要照照光线什么的，以使自己精神点儿。

李：她有没有大吵大闹的时候？

马：没有。情绪上肯定有大的波动，但她没有表现出来，没有像有些人似的胡搅蛮缠。天天看她还是利利索索的，一点儿都不邋遢。

李：她的衣服这时候是不是都变成黑的了？

马：大部分是，也有蓝的。主席一去世她把所有的衣服，毛衣什么的都染成黑色的了。我在那儿的时候她都是穿自己的衣服。

去秦城监狱之前，我接到命令给她收拾东西的时候，她出来时穿什么衣服还给她带什么衣服，给她打理好，然后放在车上，我和她一块坐在车里走的。那天早上太阳特别好，光线也特别好，一直走了很远，走到秦城，就到监狱了……

◇ 把江青送到秦城监狱

李：请你把这个过程说细一点儿。

马：1977年4月10日，交接押送任务下来后，黄介元给我打了招呼。他说凌晨要转移地方了，先让我自己作好准备，把她身边的东西都拾掇好。我们一切都听黄介元的指挥，他问我：“你们的东西都准备好了没有？”我说都准备好了。然后他就走到江青的门口（他一般就站在门口不进她的屋子），对江青说：“今天要换个地方，戴上这个吧！”江青说：“好吧！”缓慢走进卫生间，出来后，顺从地戴上手铐。

我带着江青的衣物和她坐在一辆车里，她一路上没说一句话。

李：江青没有什么特别的反应？

马：没有。有时候外边传的跟实际情况有天地之别。她当时确实是很平静，她对于自己的道路好像早就料到了。到秦城监狱后，两名女狱警把她架进了牢房。

李：架进去的？

马：反正一边一个把她带进去了。监狱的人把江青带进去，我们向狱警介绍了江青的饮食和睡眠等，交接了衣物。送她的人就随着车回来了。

杨：路途中间听说她还要求解手？

马：她是说要解手，但押解的人告诉她很快就到了。

李：送到以后她就离开你的视线了？

马：对。

李：你当时是不是已经意识到这可能是最后一次见她了？

马：意识到了。但是我想国家不会把她怎么样，因为她毕竟是主席的夫人。但是她不会有太多的自由，这个是肯定的。

从1976年10月6日到1977年4月10日，在8341部队隔离监护“四人帮”的任务胜利完成，总共187天。这6个多月，我都过糊涂了，一直以为是3个月，中间我只回过一次家。这一天是我几个月以来又可以呼吸清新空气、重新沐浴温暖阳光的难忘的一天。

◇ 多年后的一些感受

马：时隔这么多年，回想起来，在工作人员当中，我还算是遭罪少的。她平时好像没怎么说我什么。因为我是她要来的，几个条件都符合，又是科班出身的，又是有个孩子的，她又认为我的性格比较温柔，所以对我的工作还是比较满意的。

总的来说，她的衣食住行也没有什么太特殊的，除了脾气不好外。而且我们觉得她在吃的方面还有一定的科学性，一般也没有什么高档东西；穿衣上不讲究什么时髦，只讲究如何保暖，衣服她不愿意穿太新的，里边的衬衣都是旧的，棉质的；擦脸霜是小药房配制的，她从来也不用化妆品。也没有戴过任何首饰；行呢，也就是坐车坐的时间长了，会让汽车停下来，我们扶着她散散步什么的。我们做她的护士肯定很累，是闲不住的，在家里闲不住，出去闲不住，车上也闲不住，但是你要想想她要求的服务内容和方式都是对保健很有益的、适时的。比如快到冬天了，秋末就把冬天的衣服给找出来了。冬天过了快到春天的时候，春天的衣服就都给准备出来了。我所说的这一套衣服不是一件两件，从衬衣到外衣、大衣都是搭配的，颜色都是顺色搭配的，我就觉得她这些都很讲究但又是合乎生理需要的，穿上以后又特别得体。

还有一方面我觉得她的心灵手巧也是让人佩服的，你看她穿的衣服有一套蓝裙子，那是她自己设计的。1974年菲律宾总统马科斯夫人来访，为了体现主席夫人的形象和中国自己民族服装的特色，她专门按照唐三彩的样子设计了一些衣服，圆领的服装，里面带个白边，她说这个代表民族的特色，她说：“我先来试穿。”这样她就把她的好多衬衫都改成没领的衬衫，还建议女战士的衬衣、人民大会堂服务员的衣服也都改成这样的。她做这套衣服的时候，问我们这样好不好，我觉得这样也挺新颖的，说那就试试。后来浩亮、于会泳他们几个还按她的要求给弄了两套假发，她当时是想弄两个辫子给盘上去，我的理解她主要是想显得高雅一点。这个我们说看着不习惯呀，她后来就没穿出去。这意见她是听进去了。我觉得在这件事上，实际上她不是光为她个人美，也是考虑代表一个国家的形象。

江青一边在马桶上蹲着一边还看文件，有的还送主席参阅。当然，我觉得她对自己是高估了的。我就记得有一次她把邓小平叫到十楼来，当面指着邓小平的鼻子说：“嗯，主席对你三七开，对我四六开我就满足了。”意思是主席对你够好的了。

不管怎么说，我对在包括江青在内的中央领导人身边工作的这些经历都不感到后悔。

（全文完）

□ 《湘潮》2015年第6、7期

~~~~~

【百家争鸣】

## 林彪知道去苏联吗？——与张光渝先生商榷

· 舒 云 ·

“九一三”事件至今44年，仍众说纷纭。张光渝先生在《“九一三”林彪飞行目的地的逻辑推理》（原载《读书鉴史：解读周恩来》一书，《昨天》第42期转载）一文作出这样的推论：“林彪不可能为了前往大连而甩开警卫部队和机组人员急匆匆爬上飞机强行起飞，这样反常的离去手段与目的地大连在逻辑上完全无法吻合。”进而推出两个结论：结论一，李德、舒云编著的《林彪日记》说“林彪说去大连，但知不知道去苏联还是一个谜”是不客观的；结论二，“九一三”事件是林豆豆制造的，“没有她的报告，就没有今版‘九一三’事件。”

张先生的“逻辑推理”其实是不合逻辑的。

### ◇ 林彪连夜走是否就“不正常”

1971年9月12日23时过后，林彪打铃叫内勤张恒昌，说：“今晚不休息了，准备马上夜航到大连去，到大连住一个星期就回来，有些东西可以不带了。”林彪另一位内勤陈占照回忆，晚上11时50分左右，林立果、叶群、刘沛丰一起来到林彪的客厅。过了一会，叶群、林立果出来。林彪又打铃，我到林彪客厅，林彪对我说：“马上去大连，不休息了，有些东西可以不带，够用就行了。过几天再回来，回北京过国庆。”（邵一海《林彪913事件始末》，四川文艺出版社1996年3月版，第246、248页）

张先生认为，林彪没有理由连夜去大连。这是因为张先生不了解林彪，林彪连夜出走、说走就走，并不奇怪。负责专机的空军副参谋长胡萍就曾抱怨过：“林家用专机像用专车一样。”林彪、叶群都是急性子，什么时候想起了，说走就要走。

文化大革命中叶群为躲江青，就曾连夜出走过。1968年8月，江青要林彪批转她如何抓样板戏的大文章，林彪一直压着。江青要来见林彪，叶群怕林彪与江青当面顶起来，就安排林彪去北戴河了。……就在叶群听到江青要来北戴河的前一天晚上，林彪、叶群连夜离开北戴河，临时住在山海关机场（舒云整理《林豆豆口述》，明镜出版社2012年9月版，第54—56页）。

1971年9月6日晚，叶群打电话给胡萍，说林豆豆等要来北戴河，让胡萍连夜派飞机。胡萍建议第二天上午走，否则也就连夜走了。

李文普回忆：“（1971年9月12日）大约23时多，叶群叫我到林彪卧室，她先进去跟林彪说了几句话，然后叫我进去。这时，林彪早已从床上起来穿好衣服，说今晚反正也睡不着了，你准备一下，现在就走。”（李文普《林彪卫士长李文普不得不说》，载《中华儿女》1999年第2期）李文普这段回忆回答了张先生关于林彪为什么要连夜匆忙去大连的问题：是因为“今晚反正也睡不着了”。这对于不了解林彪的旁观者来说肯定是“不正常”，“非常规”，而只要对林彪的性格、作风及他当时的地位、特权多少有些了解，就不会感到奇怪。

张先生认为：“叶群、林立果欺骗林彪？有这个可能吗？林彪以为去大连，上了飞机却糊里糊涂飞往苏联？”为了证明没有这个可能，张先生举出“林彪若去大连，干嘛不带警卫

部队？不带自己的女儿女婿？这一切都是在林彪驻地而不是飞机上发生的事情，林彪干嘛要用这样的手段离开北戴河转往大连？这符合逻辑吗？”

这当然符合逻辑——符合林彪的逻辑。如果林彪每次外出都带自己的女儿，那么“九一三”事件不带自己女儿就是反常，就不符合逻辑。事实并不是这样。林彪外出并不是每次都带自己的女儿，所以“九一三”事件林彪不带自己女儿走并不反常。

至于张先生所说林彪“甩开警卫部队和机组人员”，这也是不了解林彪生活起居情况的外行话。这些具体事务与林彪无关。林彪不是我们这样的普通人，他身居高位，本来就只考虑大事，更何况林彪是个“不食人间烟火”的人，他平时与人只谈工作，决不闲聊，更不会迎来送往。他要出行，有谁跟着走，跟着走多少人，自然有人安排。甚至林彪自己的衣食住行，也用不着林彪本人操心，全部由叶群安排。

张先生认为不可能“欺骗林彪”，这又是不了解林彪情况的外行话。毛家湾的工作人员都知道，叶群欺骗林彪的事情太多了。连他心爱的女儿豆豆曾被叶群逼得以自杀抗争的事，都没有谁敢给林彪讲，林彪至死都不知道。

叶群还曾在飞行航线上欺骗过林彪。1969年8月下旬，林彪重上井冈山。返回的时候，叶群怕林彪受江西省革命委员会主任程世清的影响，限20分钟做准备，突然离开井冈山。没想到程世清还是闻讯来了，邀请林彪到南昌看一看。42年前林彪作为一名基层军官，参加了南昌起义，他对南昌的感情非同一般。林彪立即叫李文普通知去南昌。而叶群不想让林彪到南昌，她在空中下令改变航向。快到北戴河了，叶群才对林彪说实话，林彪火了：“我已经通知去南昌，你为什么改飞北戴河？航线不能改了，还是去南昌！”叶群说：“我早安排去北戴河了，不好改了，来不及改了，这个机组什么气候都能飞。”……林彪说：“我是南昌起义出来的，难道我连南昌也不能去了？！”在林彪、叶群的争吵声中，飞机继续往北飞去……（舒云整理《林豆豆口述》，明镜出版社2012年9月版，第58—60页）

叶群不仅自己骗林彪，还要求工作人员也一齐骗林彪，即便林彪拆穿了骗局，也没有用。

如果林彪临走对内勤说去大连是假，去苏联才是真，那么他事先一定会为去苏联做大量的准备。为什么具体掌管军队的黄吴李邱毫不知情？为什么林办没有任何一个人揭发出林彪有企图逃往苏联的言行？流传甚广的李文普说的林彪说“伊尔库茨克有多远”，也纯属子虚乌有。1980年8月“两案”审理期间，总政林彪案审判工作办公室预审组编的《林彪反革命集团阴谋活动大事记（1970年3月至1971年9月）》，记载了李文普若干条揭发材料，却没有记载“林彪问‘伊尔库茨克有多远’”这一“证据”。

林彪案审了十年，从文革中的中央专案组到文革后的“两案”办公室，都没有查到林彪知道去苏联的任何证据。从林彪的行为逻辑看来，林彪最后的晚上并无反常，他就是要去大连。

◇ 林彪遇到什么危险了？

张光渝先生认定林彪说去大连的话是假话时的一个“逻辑推理”是：“即使林彪发觉了危险，但采用非常手段连夜飞往大连，对避免危险来说是毫无作用的。”张先生假设了林彪“发觉有危险”的大前提，进而推论林彪要避险，只能逃到国外。

形式逻辑间接推理的基本形式之一“三段论”，是由大前提、小前提推出结论。张先生推论的大前提就错了，林彪遇到什么危险了？有什么证据证明林彪遇到了非得逃到国外去躲避的危险？

退一步说，即使林彪发现了张先生所说的这种危险，他会想到出国躲避吗？1971年9月11日12时30分，内勤听到林彪说：“反正活不了多久了，死也就死在这里，一是坐牢，二是从容就义。”（张聂尔《风云九一三》，解放军出版社1999年版，第312页）林彪还明确表示他是民族主义者，张宁《自己写自己》一书称是林彪内勤讲的。林彪内勤陈占照对我说：他是听叶群说的，林彪说他是一个民族主义者。

这说明林彪不会想到去国外躲避危险。庐山会议后林彪一直不写检讨，就说明林彪始终认为自己没有错。他安慰叶群的一个题字也是“说到底，坏不到哪里去”（见于运深口述、舒云整理《我给林彪当秘书的最后一年》），这就是他对可能面临的“危险”的态度。因此他完全没有理由跑到国外去。

#### ◇ 主观猜测与客观事实

林彪临走说去大连，而林彪飞机却坠毁在蒙古温都尔汗，这该怎么解释？

如果飞机上只有林彪一个人，那也会有多种可能性，比如迷航，比如飞机故障，不一定到达他预想的目的地大连。更何况飞机上有九个人，还可能有飞行员、机组人员或机上乘客劫机或者空中改变航向的可能。

我们现在知道，至少在1969年林彪就有两次在空中改变航向。一次是林彪从井冈山返回时本来要到南昌，而叶群却背着他命令空中改变航向，直飞北戴河；另一次是国庆节后林彪去张家口视察，林彪要看平型关，空中改变航向飞向山西。

“九一三”林彪专机是夜航，夜航中，乘客是不可能知道东南西北的。我坐过一次夜航，从哈尔滨直飞北京。两个多小时飞行中，我坐在靠窗的座位，努力睁大双眼，但机窗外犹如黑布，根本不知道飞机飞向哪里。直到飞机在北京降落，我才放下一颗心。

张光渝先生指责“（《林彪日记》）编著者以林彪曾说去大连为理由，将林彪飞往苏联的行动暗示成某种违背他的意志的强制行动”，而张先生站在“林彪知道去苏联”的立场上，却没有拿出一个证据来证明他的“逻辑推理”，只盼望“以后发现的新史实补充修订”。在“林彪知道”的“新史实”出现前，张先生的“逻辑推理”也只能是主观猜测，而不是客观事实。

#### ◇ “九一三”事件推不到林豆豆头上

张光渝先生认为：“‘九一三’事件并非‘预谋’，既不是林彪的预谋，也不是周恩来或毛泽东的预谋。如果说‘九一三’是针对林彪的‘预谋陷害事件’，那就要从林豆豆查起。没有她的报告，就没有今版‘九一三’事件。”（左图：舒云（左）和林豆豆在《解放军画报》高级记者孟昭瑞家里。孟昭瑞摄。）

“九一三”事件后，强加在林豆豆头上的罪名很多，指责她“林彪是被骗上飞机”的说法，1974年林豆豆曾以自杀表示抗议。1987年林豆豆从郑州回到北京，有关方面对

她约法三章：一不许见记者，二不许对外发表言论，三不许会见外宾。这一切都是试图封她的口。张先生说：“实际上，真正的问题不在阻拦一方，而在于出走一方，林彪、叶群、林立果如果不愿意走，谁又能让他们走呢？”张先生指责林豆豆“将罪责归于警卫部队及其上级，再在其他人的鼓动配合之下推演为某种有意致林彪于死地的蓄意的‘阴谋’。”这些话与这些年对林豆豆的攻击异曲同工。

张先生说得对：“林彪、叶群、林立果如果不愿意走，谁又能让他们走呢？”林豆豆报告的本意是要8341部队保护林彪，不让叶群、林立果带走林彪。荷枪实弹的8341警卫部队，拦阻林彪这位手无寸铁的老人有何困难？可是从林豆豆第一次报告到第五次报告，8341部队有两个多小时的充足时间，却没有接到拦阻命令，倒是接到了让林豆豆他们也上飞机的指令，最后眼睁睁看着林彪飞机强行起飞。我们完全可以反过来问一句：“如果毛泽东不让林彪走，林彪又怎么能够走成呢？”

林豆豆没有错，也不存在像张先生所说把罪责推到“警卫部队及其上级”身上的问题。嫌疑人因为办案人不作为跑了，难道要举报人负责？请张先生再重温毛泽东关于林彪专机越境前的那句话：“天要下雨，娘要嫁人，让他走吧。”

谁应该为“九一三”事件承担责任？不是一清二楚了吗？

□ 原载《昨天》第56期2015年8月30日

~~~~~

【历史疑云】

扑朔迷离：《五七一工程纪要》发现辨析

• 胡景文 •

作者按语：《五七一工程纪要》无疑是林案重要证据。但是，作者在研读史料时，发现诸家说法不一，今特撰文求博友参加分析、研判，本文作引玉之砖，望有识者不吝赐教。

董保存《知情者说·第三辑·八》叙述：9月13日晚，（北京卫戍司令）吴忠连夜审讯逃犯李伟信，李供出林彪一伙的《五七一工程纪要》，经细心讯问才知道“五七一”即武装起义的谐音。李伟信系乘直升机出逃，于9月13日在密云被生擒。

《九一三事件后的另一段秘闻》记载，（由于空军学院有林立果秘密据点），第二天（即9月14日），军委副主席叶剑英和总政主任李德生来了，连长刘俊章陪同两位首长来到楼上……两天后（9月16日），周总理也来了。他在卫戍区司令员吴忠的陪同下，一下车就直奔林立果住所的电话，电话由排长张友祥看守。总理问：“有什么人来过电话吗？”张友祥说：“电话很多，有男有女，一天十几个，可一拿起来，对方听一下声音就挂断了。看样子，他们是对暗号。”张友祥说完，就刷杯子倒水……两个月后，林彪死党大批被捕，学院又恢复了往日的平静。

事件发生后四天之内，四个中央领导连续到空军学院，当时没人提到《五七一工程纪要》，而北京卫戍司令吴忠应是第一个知道《纪要》的高层领导，此时中央高层不可能不接到报告。

《李德生回忆录》李说：大约是（9月）17、8日，林立果秘密据点的食堂工作人员交出了一个小本子，说是住在那里的人来不及带走的。总政工作组的同志看后马上送来给我，说里面记的东西很反动。我看了发现，内容中恶毒攻击毛主席，准备发动反革命政变的计划。它分析了反革命政变的可能性、必要性、基本条件、时机和力量，提出了政变口号和纲领，规定了实施要点、政策和策略、保密和纪律等等。但是看不出是什么时候、怎么写出来的。我派人提审李伟信，问他是怎么回事。李伟信交待，这是1971年3月下旬，林立果、于新野在上海按照林彪的旨意，拟定的反革命政变纲领，按照“武装起义”的谐音，取名为《五七一工程纪要》，本子里面的内容，就是于新野当时手记的政变纲领。我把原件和李伟信的交待很快报给了周总理，周总理转呈给毛主席。毛主席看后，认为搜查林彪罪行的材料中，这是最重要、最有价值的一件，要求“印发给政治局各同志阅。”

祝庭勋《李德生在动乱岁月》：9月16日空军学院工作人员向工作组反映关于笔记本的事情，并得到交来的红色塑料笔记本，李德生立即派人提审李伟信，得悉此件是林彪的《五七一工程纪要》并做为绝密件报送周恩来。

邵一海《联合舰队的覆灭》：中央已经发现了小楼这个反革命据点。（9月）17日，党中央、周总理派人来到学院，调查小楼情况。老王的心情更加紧张了。那个偷偷拿出来的本子，更加成了累赘。他们一会儿让这个保存，一会儿让那个保存，一会放在办公室，一会儿放在家里，不知如何是好……10月6日晚上，他们听到了九一三事件的传达，一个比他们想像到的还要严重得多的事实，无情地摆到他们面前。10月7日凌晨，老王终于把这个本子交给了学院领导。九日，这个本子连同老王写的一份材料，送给了周总理。

舒云《噩梦九一三》：（10月8日）19时30分，空军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主任安平、殷古风写了一封信给空军政委王辉球和副司令曹里怀，送去关于王兰义收存和上缴叛国分子林立果笔记本调查报告一份，并附有王兰义本人的交待和揭发材料。

关于《五七一工程纪要》的确真实存在，经鉴定和有关人员辨认，是于新野的字体，它起草于1971年3月份。九一三事件发生后，它才神秘地浮出水面。发现《纪要》时，于新野已经自杀身亡。《纪要》是林立果的政变纲领，只有这个文件才能有力证明林家父子企图谋杀毛泽东的阴谋活动。

关于发现和查获《纪要》原件的时间，目前有四种不同说法。一是董保存的9月13日。如果记载属实，说明在九一三事件发生当天，中央高层即已知悉林家父子有政变计划，但没有得到证据。对李伟信关于《纪要》这一重大线索，也没有陆续追查的记录。二是李德生回忆录9月17、8日，是李德生看到《纪要》原件，派人提审李伟信，李交待了有关内容，祝庭勋《李德生在动乱岁月》书中确定为9月16日。三是邵一海《联合舰队的覆灭》说法即10月7日。四是据汪东兴回忆录，李伟信交待有关《纪要》内容的材料，时间为10月13日，是在九一三事件发生一个月之后。

李伟信交待材料：“刘沛丰1971年8月在北戴河，有次对我说：前几天，天天四五点钟睡觉，吃不消。我问干什么，刘说：叶群天天找林立果，研究‘五七一’，把舰队一些人员的代号也要去了……五七一计划写成后，我没有见过。但是于新野在1971年9月11日，夸耀自己说：‘林立果把计划（指《纪要》）及一本于新野最新摘录的关于武装起义的事例，都留在北戴河首长（林彪）、主任（叶群）那里。’”二人谈话地点在北京，李、于也是从北京出逃。于新野是《纪要》起草人，知道《纪要》原件在北戴河。李伟信交待材料中的时间，指九一三事件发生前一天，当时《纪要》还在北戴河叶群处，知道这一密件的

人数有限，舰队绝大多数人没有见过，骨干人物江腾蛟也只是听说，并未亲眼目睹。而林立果是在9月12日下午6时许乘三叉戟从北京到北戴河，当夜九一三事件发生。

邵一海《联合舰队的覆灭》记载，在9月15日晚上，《纪要》在空军学院被食堂工作人员发现并秘藏。9月17日，周恩来派人到空军学院调查林立果据点情况，当事人没有交出《纪要》。而是过了二十多天，到了10月6日晚上，空军学院听传达关于九一三事件的报告，10月7日凌晨，工作人员王某交出《纪要》，10月9日送到周恩来手中。

舒云《噩梦九一三》中说法与邵一海基本相同，只是增添了有关人物名字、具体时间和送达程序，更为详细可信。10月7日午夜2时，空军学院后勤管理人员王兰义，听了报告后，把《纪要》交给空军学院政委殷古风，并写了一个材料。10月8日19时30分，空军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主任安平、殷古风写了一封信给空军政委王辉球和副司令曹里怀，送去关于王兰义收存和上缴叛国分子林立果笔记本调查报告一份，并附有王兰义本人的交待和揭发材料。10月9日，《纪要》红色拉链本和王兰义写的材料呈报周恩来。上级指示：“要好好保护上交拉链本的人。”

汪东兴《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中记载李伟信交待有关《纪要》内容的材料，时间为1971年10月13日，距九一三事件发生已经一个月了。

汪东兴和李德生是当年中央重量级人物，均为清查林彪党羽的主要负责人，他们所说的时间和过程细节应不是空穴来风。邵一海的文章看得出是根据审讯记录而编写，精确到时、分，在时间上非常严谨。董保存是采访当事人的“知情者说”，似乎也无懈可击。

据《李德生回忆录》记载，9月16日，空军学院工作人员听了李德生报告，食堂工作人员于9月17、8日交出《纪要》，后送周恩来手中。李回忆，10月24日中央决定将林彪叛国叛国事件向广大工农兵群众传达，11月14日公布《五七一工程纪要》。如果董保存《知情者说九一三》记述确切无误，那么，中央高层从知悉《纪要》内容、发现《纪要》原件到向社会公布《纪要》，共两个月时间。

第一需要考证的是，上述数种说法时间迥异，那一种更接近历史真实？

第二需要考证的是，根据李伟信交待的于新野说法，9月11日《纪要》原件在叶群处，9月12日午夜叛逃事件发生。

按常理推断，《纪要》下落只能有三种可能：第一种可能，如果这个《纪要》在北戴河林彪寓所查出，事在情理之中，慌忙逃走遗忘了。第二种可能，《纪要》由林家父子携出，三叉戟飞机坠毁后，第一个到达现场的是苏联人，飞机上散落的箱子被苏联人拿走，这个文件应在俄罗斯。第三种可能，在蒙古坠机现场随大火焚毁，不存于世间。

事情的结果却出人意料，它偏偏出现在空军学院林立果的秘密据点的餐桌上。如此只能说明，在9月12日一天之内，只能是叶群派人从北戴河把《纪要》送到北京林立果手中。叶群在数日之内策划外逃，当天安排林立衡和张清林举行订婚仪式，紧锣密鼓，明知林立果12日回北戴河，在当时情势之下，有这个必要吗？9月12日晚6时（即林立果从北京起飞时间）以前，所有文章披露的九一三事件细节，无人证实《纪要》原件在北京的林立果舰队哪一个成员手中。如果《纪要》确在北京，只能在于新野和周宇驰二人手里，是他们故意放在餐桌上的。可是9月11日于新野却对李伟信自我夸耀说，他写的计划放在“首长”（林彪）和“主任”（叶群）那里，这又如何解释？李伟信说了假话？乘直升机外逃是周宇

驰、于新野和李伟信三人，其中必有一人放“红塑料拉链本”到餐桌上，这个人肯定不是于新野。那么必然是周宇驰，李伟信能看不到吗？如果看到，为什么不交待出来？李在供词中说自己没看到过《纪要》，周宇驰自杀身死，属林彪死党确凿无疑，李伟信没有必要为他隐瞒、掩饰什么。

我们再看看当时情形：

邵一海《联合舰队的覆灭》记述，当时在空军学院小楼前停的是一辆卡车，装车的人有李伟信、王永奎、许秀绪和王琢，四个人往车上装器材、文件。小楼里面，陈伦和带着两个女青年焚烧材料。他们准备13日凌晨5点以前，把这些器材运到西郊机场，再运广州。12日晚11点多，快装车完毕，李伟信得到阴谋败露的消息，他立刻召集全部人员，告诉他们这个点暴露了，让他们立即转移到“二高专”（联合舰队另一秘密据点）待命，如果天亮后接不到通知，就各想各的办法。这些人走后，空军学院小楼里只剩下李伟信一人，过一会儿，于新野也来到这里，他刚参加完密谋南逃的会议，散会后才到。到了13日凌晨一点多，周宇驰才来到小楼。“我们预计明天到广州的计划不行了，肯定没有飞机了”。周宇驰喘着粗气说：“立果同志给我打电话说，他们争取走，叫我们也尽量多组织一些人走。现在只能用直升飞机跑了。”他望着站在面前的两个同伙，环视一下凌乱的房间，问道：“许秀绪他们呢？”于新野说：“他们刚走，到二高专待命去了。”“来不及叫他们一起走了！”周宇驰急促地对于新野说：“你立即到西郊机场把陈士印接来，我现在去不得。我在这里给他打个电话，叫他在门口马路上等你。”邵一海的记录显然是根据有关审讯材料记录撰写，可信度高。这段记述说，在小楼里焚烧材料的是陈伦和与另外两个女青年，而陈伦和在舰队里是小角色，《纪要》不可能在他手中，陈伦和至今尚在为自己不明不白卷入九一三事件呼冤。

当时清理后的现场只剩下李伟信，第二个到来的是于新野，第三个才是周宇驰，三人对面，什么动作都不会瞒过李伟信的眼睛。综合分析，三个人中，谁也没有可能将《纪要》放在餐桌上。如果有，只能是李伟信放的，可是李伟信交待自己从来没有看到过《纪要》。他们三人离开小楼时，应该在13日凌晨2时左右，人去屋空连门也没锁……空军学院后勤王兰义发现，13日白天一天没人，14日一天没有人，到晚上10点，王兰义才给小楼大门加上锁。15日夜间，王兰义等三人发现红色封面拉链本。到16日晚8点，王兰义等三人才将红色封面拉链本取回秘藏。

再看直升机迫降后，周宇驰、于新野在自杀前，从口袋里掏出林彪亲笔手令，撕得粉碎，于新野从口袋里掏出林彪9月8日给黄永胜的信撕碎。直升机上物品被送到卫戍区后，经拼接主要罪证有五件：一是林彪手令：“盼照立果、宇驰同志传达的命令办。林彪，9月8日。”二是林彪给黄永胜的信：“永胜同志，很惦念你，望你任何时候都要乐观保护身体，有事时可与王飞同志面洽。敬礼！林彪”。三是林彪集团“小舰队”的名单。四是林彪一伙企图乘机南逃另立中央的机号、人员安排表。五是广空参谋长顾同舟写的信，内容是广州军区政委刘兴元传达毛主席南巡时的谈话要点。手令和信函带在身上，却把和这些同样重要的《纪要》放在餐桌上，令人不解。

九一三事件发生后，林立果联合舰队成员，当时留在北京的、南逃的均已落网，无人供述关于《纪要》的情况，他们对此一无所知。

周宇驰、于新野外逃，在迫降后口呼“林彪万岁”决绝自杀，说明他们是林彪死党。《纪要》究竟在不在他们手里？死无对证。所有机密文件都装飞机带走，独把《纪要》放在小楼内餐桌上，他们不知道这是白纸黑字的罪证吗？周、于都是空军司令部处级干部，有头

脑有分析能力，叛逃会给自己妻子儿女父母家庭带来什么后果，他们心里都会十分清楚，留下罪证意味着什么？还是要昭告天下表示破釜沉舟的决心？

据目前能看到的资料，见过这份《纪要》的共四个人，即：计划发起人林立果，起草人于新野；李伟信交待的林彪、叶群，其中三人已死。

迄今为止，除了李伟信的交待，没有任何回忆录涉及《纪要》的流转过程，也没有人证实在9月12日这一天北戴河派人去北京送密件的记录，这份《纪要》太重要了，它的机密程度关乎林家父子的命运，不会轻易交到外人手中。但是，这份《纪要》怎么到的北京空军学院林立果秘密据点？发现时间上说法不一，情理上不大可能，它在餐桌上出现不是令人不可思议吗？

舒云《噩梦九一三》中评论：这里有个疑点，《纪要》的小本子为什么放在桌子上？来不及烧掉吗？粗心吗？于新野带到直升机上大批的文件，远没有这个本子重要的笔记本都带走了，为什么这个本子却落下了？非常奇怪！事情还没有到火燎眉毛嘛，连空白笔记本都从容烧了，为什么写着《纪要》的本子却放在桌子上，生怕别人不拿走？

记在红色拉链本上的《纪要》，经李伟信、程洪珍、刘世英识别，并同于新野其它笔记对照，认为这是原稿。用铅笔编了页号，从第1页到第24页，中间缺第8页，可能是编码时出了错。负责九一三专案的纪登奎认为，里有许多话是骂毛主席的，不能印发。毛泽东说，这一件最重要，必须下发。

张聂尔《风云九一三》认为：这个故事很玄。但愿有一天“这个人”能出来写段回忆文章。假设这一切属实，则只能证明一点，那就是林立果及其死党在最后一刻是做好了死的准备的，他们故意留下《纪要》，告诉世人他们为什么而死。

张聂尔《风云九一三》评论《五七一工程纪要》说：林立果不是林彪，身后没有战功，手中没有军队，于是他组织了自己的小集团——极少数思想、意趣、情绪相投的人成天在一起谈论政治，渐渐形成了他们的政见，这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五七一工程纪要”。尽管这个《纪要》就连有的被认定是小“舰队”核心人物的人都没有看见过，但这个纪要确实出自于于新野的手笔，并据分析确是林立果他们的想法。要说《五七一工程纪要》是满纸胡言，并不确切。从某个角度某些内容讲，它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中说出了某些人想也不敢想或敢想不敢说的话。但这个纪要通篇充满了极端情绪，自我膨胀，杀气腾腾，令人联想起十九世纪二十年代俄国的“十二月党人”——那些指望靠军事密谋推翻沙皇尼古拉二世的贵族军官。但林立果小集团的真正知情者比“十二月党人”可少得多。说白了只有六七个人，他们到底能做成什么呢？

九一三事件发生距今近四十年，除官方文件记载之外，一些回忆、口述及纪实性作品陆续发表，对于廓清事实、解释谜团、明了细节、保存史料具有很大的价值。再回到《纪要》发现时间诸多不同说法，回顾“舰队”成员们的交待与当事人回忆文章，给人们无限的探索与推理空间，在扑朔迷离中我们能窥见历史的真相吗？

□ 原载作者博客 2010-04-12

~~~~~

## 【劫后反思】

清华文革反思——“红卫兵运动”的兴、盛、衰

• 邵济群 •

从大尺度上来看，清华人在文革中只干了三件事：赶走工作组、打倒刘少奇、以一种奇特的方式终结了全国的武斗。这三件大事也标志着“红卫兵运动”的兴起、鼎盛与衰亡的三个阶段。注意，我们这里所说的“红卫兵”并非特指某个组织，它既包括早期的“老兵”和“联动”，也包括后来自称“红卫兵”的各种造反派组织，例如“清华井冈山”、“新北大公社”等。

从表面上看，轰轰烈烈的“红卫兵运动”似乎是“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或“给社会以民主与自由”等美好宣称的具体体现，实质上，它不过是专制独裁者在政治斗争中的木偶与炮灰而已。清华的文革，也可以说，就是这样一个缩影。

### 一、赶走工作组——红卫兵兴起

1966年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充满杀气的题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当晚毛泽东又批发广播了北大聂元梓的那张大字报，此后，清华经历了“反蒋”与“保蒋”，“反工作组”与“保工作组”的争夺战。平心而论，到七月中清华园里“反工作组”的势头已被压制住，不再有什么影响力了。

七月下旬，中央文革小组陆续出面介入，传来“工作组压制革命群众，阻碍运动”的话，要撤销工作组。于是又有人，受“高”人指点，赶快给“工作组”、给王光美贴大字报。到八月初，入驻清华的“工作组”在部分“革命群众”的锣鼓声中，体面地撤离了清华园。

实际上，七月中毛泽东返回北京后，于7月24日召集中央常委和中央文革小组开会，正式批评了刘少奇、邓小平，做出了撤销工作组的决定。仅靠后来校园中的几张大字报，工作组哪里就会自动离去呢？

杨继绳同学认为，“毛泽东和刘少奇把清华当作一个角斗场。在这场角斗中，刘少奇先出招，毛泽东后发制人，置刘少奇于死地。”

我觉得这种看法有点简单化和表面化。

事实上，自从6月1日批发了由康生暗地鼓动北大聂元梓写的大字报之后，毛泽东便把刘少奇推到第一线来领导他的文化大革命。问题是，既然毛早已蓄意要打倒刘，毛自己发动的文革为什么还要让刘来领导？现在看来，这显然是“工于心计”的毛给刘设的一个局。毛把文革之火点燃之后，便躲到“西方的一个山洞里”（指其老家韶山的“滴水洞”），在幕后观察。他实行的还是“反右”时的“欲擒故纵，以逸待劳，引蛇出洞，聚而歼之”的老策略。

的确，工作组是刘而不是毛派的，不过毛已算好刘的“棋路”，知道他会怎样“出牌”。毛间或以社论或通过文革小组成员讲话来扇风、干预，诱导、鼓动、教唆、挑逗并激化矛盾，搅乱局势，以至无论刘怎样动作——“放手不管”也好，“压制群众”也好——毛都可以抓住辫子，将他逼上绝路。最后终于给毛等到了机会和借口，凭借多年来“造神运动”给自己树立的威望，把群众的怒火一举烧向刘少奇。毛抓住聂和蒯这两块石头，在1966年8月5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召开期间，以其一张“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揭示

出他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真实目的，新帐和老帐一起算，在全国掀起了打倒刘少奇的高潮。

现在来回顾，可以说，以聂来“投石问路”，在北大布阵，诱敌深入，原是在毛的设计之中；而蒯大富和王光美在清华的纠缠，对毛而言，则是一个意外之财。没有后者，毛照样会在派工作组的事情上收拾刘少奇，这一点可以从北大率先驱逐工作组看出。至少从7月15日起，北大工作组长张承先已受到来自“上面”的批评。随后，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有计划、按步骤先后四次云集北大，名为“听取不同意见”，实为为“踢开工作组”定调子。江青开始打出了毛的旗号：“我是代表毛主席来看你们的”。北大同学曾来清华点火赶工作组，遭到驱逐，故清华驱赶工作组的波峰比北大要滞后一个位相。

无论如何，燕园和清华园里这场自上而下精心导演的，急上、急下、急转弯的过山车游戏已告一段落。当真相被揭示出来之后，无论是造反派还是保守派，不免总有一种被作弄、被演戏的感觉，这就是毛运动群众的手法，或者说是，“无产阶级专政之下的社会主义大民主”。

与工作组被赶走的同时，毛泽东于8月1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开幕当天，亲笔撰写了《毛主席给清华附中红卫兵的一封信》，作为会议第二个文件下发，并附有清华附中关于“造反有理”的几份大字报内容。毛泽东对之的“热烈支持”，使“红卫兵运动”在全国像瘟疫一般地迅速爆发，各地各种“红卫兵”组织蜂起，矛头直指信中所说的“一切剥削压迫工人、农民、革命知识分子和革命党派的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他们的走狗”，也就是“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红八月”的“红卫兵”以血腥和暴力的方式，拉开了“文化大革命”舞台沉重的帷幕，而这场大戏幕后“运筹帷幄”的总导演就是毛泽东。

## 二、打倒刘少奇——红卫兵鼎盛

自从1966年8月“炮打司令部”以来，毛泽东更是八次接见了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毛泽东意识到，挑动由狂热的青年学生组成的“红卫兵”团体去“批斗走资派”，可使他的政治对手即刻“土崩瓦解”。你想，面对狂怒群众的文武暴力，谁敢且谁又能有任何招架之功？如稍有反抗，便加以“镇压革命群众运动”之罪名，予以“肉体消灭”。至于谁是“走资派”？斗谁？保谁？一切都由毛和“中央文革小组”的几个人说了算，“革命群众”只有揣摩、紧跟的份儿，若有任何“非分之想”，敢越雷池一步，定遭同类的“砸烂狗头”——此即“大民主”。“红卫兵”所有的“革命行动”都不受“宪法”与“党章”的约束，更无所谓对“人权”和“人格”的尊重，一切都可以“无法无天”地干——此即“大自由”。

1966年12月18日，在毛泽东的授意之下，中央文革的张春桥单独召见蒯大富，讲“中央那一两个提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至今仍不投降，你们革命小将应该联合起来，发扬彻底革命精神，痛打落水狗。把他们搞臭，不要半途而废。”蒯衔命而去，旋即率领“井冈山兵团”搞了个“12·25”大行动，把打倒“刘、邓”的口号响遍北京城，颇得毛泽东的赏识。

在这样两条路线、两个司令部的斗争——或简称“毛刘之争”——中，在毛派的授意和操纵之下，清华“井冈山兵团”冲锋陷阵，为毛泽东立下了辉煌的“汗马功劳”。从“批斗王光美”到“打倒刘少狗”，从“革命串联”到“揪刘火线”，这一类活动“层出不穷”，

可以说是把“红卫兵运动”推到了最高潮。至此，“破四旧”的“红卫兵”已晋级成为毛氏文革之“御林军”。

《孙子兵法》曰：“攻心为上，攻城为下”。毛泽东通过“红卫兵”“无孔不入”的造舆论、造声势，的确在全国把他“久攻不下”的刘少奇搞臭了，同时自己也变成了人们心目中的红太阳“神”。

惯性的力量是可怕的。现在，几乎半个世纪过去了，虽然对毛泽东的评价仍是争议不断，有趣的是，对刘少奇的看法却多是负面的。似乎，无论文革成败，刘都是个历史的千古罪人。毛派人士不必说，就连现在一些主张政治改革的开明人士中，也普遍流行这样一种看法：毛泽东固然不好，但刘少奇也不怎么样。他们主要的理由都是在“刘捧毛上台”和“毛刘都一样”上做文章。

一些“造反派”认为刘少奇捧毛上台，是其人品所致，他只是垂涎那“山寨”的二把交椅，嘲笑刘是“被他自己抬起来的神砸死的”，自作自受。但“红卫兵”和“造反派”也忘了，文革中正是自己把毛泽东捧上了天，只是后来抱怨遭到抛弃和整肃，才明白是受了毛的蒙蔽。如果结合自己的感受，回顾四十年代的情形，我们又比刘少奇高明多少？恐怕是还不如他吧！

中共“七大”时，毛泽东显示的“政治才干”和“领袖魅力”，的确迷惑了党内外的一大批人，那会儿，不只是刘一个人捧毛。一直到文革时，“三忠于”、“四无限”、“誓死保卫红太阳”等口号满天飞，这又是从哪里来的？即使是现在，对“领袖”的肉麻吹捧不还是一样吗？中国历史上人们喊“吾皇万岁”喊惯了，真是听着极舒服，喊的更起劲。这是源于中国浓厚的封建文化的一种劣根性，是长期生活在“君王制度”下人们的一种陋习。我们的社会，自上而下，似乎很难接受“公仆”和“民主”等“公民主仆关系”的概念，相反，奴隶心理、奴才习性却刚好与“帝王思想”、“个人迷信”配为一对。这也是一种“中国特色”吧？

另一些人认为“毛刘都一样”，因为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彭德怀、陈毅等，他们都为中国共产党打天下、坐天下立下了丰功伟绩。他们全都信仰共产主义，全都迷信无产阶级专政，在保卫共产党政权这一基本点上是一致的，本质上没有差异。

是的，他们都是共产党，但共产党并不是铁板一块。其中每个人的经历、教育、品质、性格、悟性并不都一样，我们要看到这方面的差异。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毅、聂荣臻、李富春等是见过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从总体言行来看，他们更体察民情民心，更尊重知识和知识分子，对人对事更包容、更“通情达理”，更“实事求是”，更有世界和人类的眼光。不错，他们都信仰马克思主义，但各人的理解完全不同。刘少奇正确地理解了马克思，坚持在封建主义专制的中国要先发展“资本主义”。毛泽东没有读懂马克思，他信的更多是秦始皇，是他自己。毛泽东不是管彭德怀叫做“革命的同路人”吗？就是从民主革命走到“社会主义”革命阶段，就不再跟他走了。质朴的彭德怀未必读了马克思，但他关心民间疾苦，即使跟着毛打了天下，彭德怀也是反对毛搞他的那套“社会主义”的共产党人。更不用说党内还有过像胡耀邦与赵紫阳那样开明的领袖，还有过许多所谓的“走资派”干部、文人、学者、知识分子，这些人有文化、有教养，坚持“独立思考”，接受民主自由的人文思想和人道主义；他们认同和欣赏刘少奇的方针和路线，一贯以不同方式顽强地抵制毛的那条封建专制的“社会主义”路线。

当年红军拒绝十九路军抗日的蔡廷锴将军，只因为“哪有猫儿不吃油，哪有军阀不是反革命？”这样的一句话。解放后斗地主，根据“天下乌鸦一般黑”的生物界现象，就论定所有地主都是坏的。如果现在认为“只要是共产党，那就一定都姓毛”，这种“左”派逻辑貌似“洞察一切”的深刻，实在是太简单化了。当前的重点是要批毛，如果看不到差异，看不到路线斗争，一概而论，把水搅混，倒轻易放过了毛泽东。

和指责“刘捧毛上台”一样，说“毛刘都一样”也是一种偏见。偏见的一个特点，就是不能“换位思考”。

说来好笑，前些日子有位电视节目主持人谈起文革时，说清华大学的二校门是被蒯大富的“红卫兵”拉倒的，云云。这事乱扣在老蒯头上，他肯定觉得很冤枉。可是，不要说事隔几十年，就是在文革当中，许多被抄家批斗的老头、老太太，哪里分得清什么“清华井冈山”和“西城纠察队”的区别？又如何懂得什么天派、地派，团派、四派的复杂性？他们只知道戴着红袖章的就是“红卫兵”，“红卫兵来啦！”——就是“都一样”地跟着毛主席来要他们的命了，不是吗？

如果把上面说毛刘“都一样”的话，改换稍许，说“红卫兵”和“造反派”都为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立下了丰功伟绩。他们全都信仰“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全都迷信毛主席，全都搞“打砸抢”、搞“武斗”，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这一基本点上是共同的，本质上没有差异！他们自己会有什么感觉？——天大的冤枉啊！我是受蒙蔽的，我没有“打砸抢”，没有参加过“武斗”，我很讲“政策”，和另一派不一样！要区别对待呀！——是不是？

又有些人说，搞“文革”是因为刘威胁到毛的权力了！但掌握权力，归根结底，还是为了推行自己的治国理念。权力之争的背后还是政治路线之争，如果权力之争到了“不共戴天”的地步，就说明，这两条路线的差异有多大，怎么能说是“都一样”？

让我们先撇开政治，不谈什么“社会主义”、“资本主义”。要是六十年代的“困难时期”按刘少奇的主张做，能够“少死几千万人”，就很了不起！毕竟那是几千万条性命啊，这就是巨大的差异。这里包含执政是否有“以人为本”和“人道主义”的观念。当年刘少奇讲大饥荒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造成的，怒斥毛泽东说“人相食，你我是上（史）书的！”——“在乎生命”，仅此一点，刘少奇就是很不错了；更何况他的“走资派”路线在中国是完全合乎社会发展规律，合乎马克思主义的道理。

现在的一些反思舆论往往只是谴责文革中“打人”的人不能忏悔道歉，但文革中跟着毛泽东以文武暴力去打倒“党内最大的走资派刘少奇”，批斗各种“反动学术权威”，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红卫兵”和“造反派”，今天有没有想过，自己是不是和延安肃反时一样，也跟错了领袖，斗错了人？有没有自责狂热地把毛捧成“红太阳”？有没有为文革时“助纣为虐”、“为虎作伥”而痛悔？有没有追究为什么自己会受蒙蔽？有没有考察国人为什么难能“独立思考”？很少。多数仍旧停留在指斥早期“红卫兵”打人的行为，嘲笑“刘少奇捧毛，自食其果”的浅层次。自己呢？还是一段“造反有理”的光荣历史，或只承认“受了蒙蔽”。……

如果今天认真反思文革的话，我们不能不回答：这场你死我活的“毛刘之争”，到底是谁该死？谁该活？那两条路线的斗争，究竟哪条路线是反动的？哪条是正确的？这里没有中间路线可言，因为两个相反的矢量无法构成一个有合力对角线的“平行四边形”。



### 三、工宣队进校——红卫兵衰亡

“红卫兵运动”是一把双刃的剑。它的文武暴力，固然为毛泽东打下“全国山河一片红”的天下，但同时也深深地种下了“无政府主义”的祸根。恰如同“飞去来器”一般，它最终又打回到这位文革“始作俑者”自己的头上。

“红卫兵”从一开始就分有不同派别，双方辩论不过，往往就老拳相见。自1967年始，全国各地的“革命群众组织”又面临着夺权的诱惑，在中央文革“文攻武卫”的指示下，更爆发了大规模的“武斗”。1967年7月20日在武汉，连毛泽东自己也几乎为“革命群众”围困挟持，险些成了“瓮中之鳖”。这是毛泽东所不希望看到的事。

1966年12月26日，73岁生日那天，毛泽东曾兴致盎然地祝酒说：“为展开全国全面内战干杯！”后来的他却不得不三令五申地下指示、发通告要制止武斗。但“潘多拉”的盒子既已打开，“造反派”们为自身的存亡计，各以“情况特殊”为由对之“置若罔闻”，使毛的“大联合”计划成了泡影。

清华也不例外。1967年中“井冈山兵团”分裂出来个414派，双方都宣称自己“无限忠于毛主席”，“誓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经过一年多唇枪舌剑的“语录仗”，“批判的武器”终于变为“武器的批判”，清华园的武斗开始了。在两派心目中都把对方的同学看作是些反对毛泽东的十恶不赦的“魔鬼”，因此一定要消灭掉。加之毛以最新语录“火上加油”，曰“文化大革命是国共两党斗争的继续”。既然是打国民党，那自然是你死我活了，在手段上就更可以无所不用其极。双方攻城略地，构筑工事，武器很快地从长矛、弹弓等冷兵器升级为步枪、手榴弹，也有土坦克、燃烧瓶。攻击性更强的老团围困老四据点时，采取停水、停电、火攻、投毒等手段，甚至以狙击步枪封锁道路，猎杀无辜，以致困守“科学馆”和主楼的老四处于极端艰难的状况。此后团派不断制造事端，使武斗升级，除了想要压垮414之外，还想压中央表态。414则几次在京城抬尸游行，抗议团派杀人，亦是希望上边出手解救。

武斗中处于劣势的414顽强的坚持，终于让毛泽东坐不住了，他必须结束全国这种失控的状况。于是毛重施“运动群众”的故技，请工宣队、军宣队来“领导”清华的“革命运动”。真不知这和刘少奇派的工作组有什么不同？

制止武斗是件好事，可是，毛泽东为什么事先不打招呼，让毫无准备的工人们领命前往武斗地区送死？学生领袖们对此百思不得一解。（见本网另文，小鹰：《“七·二七”之谜》，2014年9月）现在看来，这显然是毛故意给学生们的一个局。你想，学生们如果识相缴械便罢，如若不依，打死打伤无辜工人，他们自然理亏嘴软，不由得听任摆布，而吃了亏的工人们则更记恨这些“臭老九”，伟大领袖便可以从中渔利。

1968年7月27日上午，入驻的几万工人，不明就理，手持毛语录，懵懵懂懂地来到清华。414自是盼来了“救星”，立即放下武器，配合行动。工宣队却受到团派的武力抵抗，结果死五人，伤731人。那时狂傲的老蒯，自持是毛泽东的文革宠儿，眼见得眼中钉414即将被压垮，岂肯就范于半路杀出的什么工宣队？他向毛告状，要抓黑手，不料正抓到了毛的头上，自讨了一个没有趣。在入驻的工人死伤多人之后，7月28日凌晨3点半毛才出面接见了五位学生领袖，“英明地”指出，他所倚重的“小将”们没有按照他的方向去搞文化大革命，“犯了错误”，文革要由工人阶级来领导了。

这样的表态实出乎两派意料，团派尤甚。“狡兔尽、走狗烹”，小将们的历史任务完成，该是下乡上山，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时候了。

那些死伤的工人们呢？后来似再未见有人提起过。现在想来，他们实在有点冤枉，既然伟大领袖的话是“一句顶一万句”，如果老人家早点出面，工人们的死伤本来是完全可以避免的。不过，这样一来，就不易拿住小将们的短处而一举镇住他们，亦不能突显领袖的英明。况且领袖也讲过：“要革命就会有牺牲，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为了及时抛弃鸡肋、顺利完成文革换马之大计，区区几个工人的性命，又何足挂齿？毛后来只用几顶高帽和转赠几个外国芒果便抚平了工人们的怨气，可谓既周到又经济。

学生们下台了，除了迷茫和失落之外，他们是否还有什么东西值得自慰呢？或更一般地问，如何看待文革中两派的斗争呢？

多年来，和许多人一样，我一直认为，文革中两派都是毛手中的棋子，半斤八两，互斗毫无意义。现在细想之下，也不尽然。特别是造反派之间旷日持久的明争暗斗，破了毛的如意算盘，让他的“七、八年来一次文革”的美梦，变成“来一次七、八年”的尴尬。看到他后来“骑虎难下”、“众叛亲离”、“枪法大乱”的狼狈相，着实也有些快意。试想，如果当时人们对他百依百顺，诸事都遂了他老人家的意，让“四人帮”顺利接掌江山，那中国还不知要倒退到什么黑暗的地步去了！在这个意义上，4 1 4 坚持信念、殊死抵抗是令人感佩的。他们和所有不合毛意派别的存在一样，阻挠了毛尽早结束文革的计划，尽管他们还都自以为是在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

从毛7月28日召见五大学生领袖时的讲话来看，毛泽东是明显地痛恨4 1 4坏了他的大计，而偏袒心仪的蒯大富团派。对后者毛只是大骂他们“愚蠢”，而且去而复返，再次特别交代“‘我走了，又不放心，怕你们又反过来整蒯大富，所以又回来了。’毛主席对在场的中央领导说：‘不要又反过来整蒯大富啦，不要又整他们。’”杨继绳同学认为，这很令人感动。

是这样吗？

毛泽东枭雄一世，整人无数，在政治斗争中，只有“其乐无穷”，哪里有过什么恻隐之心？他这样嘱咐，不过是表达其“投鼠忌器”的隐忧，器者即他自己，“文化大革命”的“始作俑者”。他晓得，若是否定他所依仗的“红卫兵造反派”，那下一步就是要否定他自己了，恰如1959年的“庐山会议”，若是否定了“三面红旗”，那就意味着否定他自己一样。在7月28日那次召见中，毛泽东和造反派都流了眼泪。那天北京阴天，正下着小雨，毛似乎预感到“新鬼烦冤旧鬼哭，天阴雨湿声啾啾！”的凄凉和恐怖。毛泽东运动群众、算尽机关，撒下怨恨与分裂的种子，最终自食其果，活该！

通过“七·二七”事件，毛泽东公开出面，总算是摆平了他仰仗的“红卫兵”造反派与全国无政府主义“武斗”的矛盾势态。此后，“工人阶级领导一切”，“红卫兵”小将开始淡出历史舞台。1968年11月，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决议以“头号走资派，叛徒、内奸、工贼”等恶谥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其肉体亦按需要及时地“病故”消灭，蒯大富等则毕业分配，黯然离开了北京城。两年之后，在毛泽东的默许之下，全国大规模开展清查所谓“五一六”分子的“X色恐怖”，自此，喧嚣显赫一时的“红卫兵”和“造反派”即已“声名狼藉”、“荡然无存”矣。而毛泽东悄悄地完成了这个政治切割，抽身而退，他和他的“文革”依然“神圣”，不容否定。

人间的悲剧往往由真诚与欺骗、梦幻与现实、良善与邪恶、坦荡与暗算、爱情与仇恨、忠贞与背叛、南辕与北辙、希望与绝望等元素构成。尽管大多数文革参与者都是些真心追求美好理想、希望社会进步的无辜青年，他们不惜为之付出自己的青春和生命，然而，类似于清末效忠皇权的“义和团运动”，“红卫兵运动”，在整体上，却是一场违反社会发展规律的群体盲动，加之过程充满如上诸矛盾要素，因而，这绝对是一场国人不可忘却的历史大悲剧。

历时两年多的“红卫兵运动”是中国现代史上的一个独特的现象，它发源于清华，也终结于清华。“红卫兵”与毛泽东的关系及其教训，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文化课题。

改写于 2 0 1 4 年 9 月

---

|                                                                                                                        |             |          |
|------------------------------------------------------------------------------------------------------------------------|-------------|----------|
| 本期编辑：                                                                                                                  | 《华夏文摘》执行编辑： | 《CND》总编： |
| 胡海科（美国）                                                                                                                | 思语（美国）      | 陈天寒（美国）  |
| 《华夏文摘》网址： <a href="http://www.cnd.org/">http://www.cnd.org/</a> ，国际刊号 ISSN 1021-8602                                   |             |          |
| 投稿专用地址： <a href="mailto:tougao@cnd.org">tougao@cnd.org</a> 其它事项请电邮： <a href="mailto:cnd-cm@cnd.org">cnd-cm@cnd.org</a> |             |          |

---